

马克思列宁主义 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

馬克思列寧主義論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

編輯者：中共雲南省委党校

出版者：雲南人民出版社（昆明書林街100號）

印刷者：雲南人民印刷廠 發行者：新華書店雲南分店

*

1958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數：81,000

開本：787×1092 $\frac{1}{32}$ 印張：3 $\frac{12}{16}$ 印數：1—4,088

（雲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新字第0011號）

統一書號：3116·25

定價：(5)二角六分

責任編輯：羅武 封面設計：吳國誠

編 著 說 明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反黨反社会主义的陰謀，已為全國人民的反右派斗争粉碎了，他們的各种反黨反社会主义的謬論已在斗争中被駁得体无完膚了。這場斗争，是我們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一次偉大的社会主义革命，這場斗争的勝利，不僅粉碎了資產階級右派企圖在我國使资本主义復辟的陰謀，同時，對全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也是一次極其生動的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當資產階級右派向黨向社会主义發動猖狂進攻的時候，在我國一部分人中間，特別是在不少知識分子中，曾一度呈現出思想混亂，一股修正主義的暗流在他們的腦海里盪漾，他們中間有的竟做了右派的俘虜，為右派的進攻呐喊助威，有的則一時迷失方向，莫辨是非。這一情況十分有力地告訴我們，要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取得社会主义的徹底勝利，我們還必須與資產階級思想進行長期的斗争，必須經常地在全國人民中開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為此，我們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主席的一些著作中，及党中央負責同志的言論中，摘錄了有關馬克思列寧主義論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部分，編輯成冊。以供同志們在學習中參考。

由於時間倉促，特別是限於我們的水平，因此在材料收集方面是很不完備的。其中有些重要的東西不免有不少遺漏，希望讀者給予批評指正，作為我們今后改進工作的參考。

1957年10月

目 錄

无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必須有国际援助.....	(1)
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国际團結、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團結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大團結.....	(17)
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世界无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所必經的共同道路.....	(17)
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國際團結、愛好和平的國家的團結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大團結.....	(26)
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	(45)
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上的觀点是根本对立的.....	(45)
反对國際关系上和國內民族关系上的反动民族主义.....	(63)
堅持无產階級国际主义，反对侵略战争，爭取世界和平，保衛我国社会主义事業的勝利.....	(89)

全世界无產者，聯合起來！

馬克思 恩格斯

无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必須 有国际援助

这样，既然公社是法國社会中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亦即真正民族的政府，那末，由于它同时又是工人的政府，爭取劳动解放的勇敢战士，它就是十足國際性的。当普魯士軍隊把法國兩省土地归併給德國的时候，公社把全世界的工人都归併到法國方面來了。

第二帝國是普天下詐騙勾当的節日。世界各國的坏蛋都响应了它的号召，趕來參加它的狂欢大宴和掠夺法國人民的勾当。甚至在目前，梯也尔也还是以瓦拉希亞地方的騙子蓋尼思科为右手，而以俄國的偵探馬爾科夫斯基为左手。公社則使一切外國人都有机会享到为了不死事業而光荣死去的荣幸。資產階級在由于它叛变而招致失敗的对外战争和由于它同外國侵略者陰謀勾結而激起的國內战争之間这段时间內，乘机利用在法國全境進行警察殘害德意志人的办法表明了自己的愛國精神。公社則委任了一个德意志工人做自己劳动部長。梯也尔、資產階級、第二帝國，都經常一貫地欺騙了波蘭人，口头上冠冕堂

皇地對他們表示同情，實際上把他們出賣給俄國，一味干着俄國的骯髒勾當。公社則對波蘭的英勇子弟表示尊敬，任命他們擔任領導巴黎捍衛者的職務。為了更鮮明地標明由公社自覺地開辟的歷史新紀元，公社在一方面有普魯士勝利者當前，而另一方面有波拿巴的將軍所部波拿巴的軍隊當前的情況下，推倒了象徵戰爭光榮的龐然巨物——樊多姆廣場上的圓柱。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1871年，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1卷，莫斯科1954年版，505至506頁）

歐洲各國政府在巴黎面前已表明了階級統治的國際性質，而現在他們自己却向全世界叫喊，說這一切災難的主要原因是，在於國際工人協會，即在於反對全世界資本陰謀的國際勞動組織。梯也爾責備這個組織是勞動的暴君，而把自己說成是勞動的救主。皮加爾禁止法國境內的國際會員跟國外的國際會員維持任何聯繫；梯也爾的1835年同謀者，那個已成了木乃伊的饒培爾伯爵聲稱，根絕國際是每個政府的主要任務。“地主議員”們狂叫起來反對國際，而歐洲各國報刊則一致隨聲附和。有一位與我們協會毫不相干的可敬的法國作家，對於國際這樣評論說：“國民衛軍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大部分公社委員，都是國際工人協會里最積極、最清晰和最剛毅的頭腦。這是些完全忠實的、真誠的、聰明的、富于自我犧牲精神的、純潔的和照最好意思講的狂信的人物。”充滿警察精神的資產階級腦袋，自然要把國際工人協會看作是一種秘密陰謀團體，其中央委員會不時指定在各國舉行暴動。實則我們的協會只是個團結文明世界各國先進工人的國際協會。無論階級鬥爭在何處表現出來，無論它採取何種形式，無論它在何種條件下加強起來，——

到处当然由我們協會中的會員帶頭。產生這個協會的基地就是現代社會本身。無論灑流多少鮮血，都不能把这个協會消滅。要消滅它，各國政府首先應當消滅資本對勞動的橫暴統治，即消滅它們自身寄生性生存的基礎。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1871年，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1卷，莫斯科1954年版，521頁）

當然，工人階級為了一般能夠鬥爭起見，必須在自己國度內組成為一個階級，而它直接的鬥爭舞台就是它自己的國度。所以，它的階級鬥爭不是在內容上，而是象共產黨宣言所說“在形式上”是民族的。……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莫斯科1954年版，25頁）

……雖然德國工人黨首先是在它所處的國境之內進行活動（它沒有權利代表歐洲無產階級的名義來講話，尤其沒有權利講什麼錯誤的話），然而它意識到自己和各國工人團結一致並經常準備今后亦象過去那樣履行由這種團結一致而來的義務。即使不把自己視為或宣布為國際的一部分，這種義務也是存在着的；例如屬於這種義務的有在罷工期間援助工人和杜絕工賊行動，关心使德國工人通過黨機關報刊了解國外運動的情況，鼓動反對逼近的或在爆發的王朝間的戰爭，在這種戰爭期間則實行象在1870至1871年間模範地實行過的策略等等。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莫斯科1954年版，38頁）

……社會民主主義的運動，根本上就是國際的。這不僅是說我們應當反對本國沙文主義，而且是說在年輕國家內剛剛開始的運動，只有在它運用別國經驗的條件下，才能順利發展。但是，要真能運用別國經驗，單單認識這種經驗或單單抄襲別國最近的決議，是不夠的。為此就必須善于用批評的態度來看待這種經驗，獨立地檢查它。誰只要想一想現代工人運動已發展和散播到了如何廣大的地步，就會懂得，為了履行這個任務，該要有多少豐富的理論力量和政治經驗（以及革命經驗）。

（列寧：“做什麼”，1902年，載“列寧文選”兩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197頁）

……勞動底利益要求在各國勞動者間，各民族勞動者間，有最完全的信任和最緊密的聯合。擁護地主資本家，擁護資產階級的人都力圖分裂工人，加強民族糾紛和民族仇視，這樣來削弱工人，鞏固資本政權。

資本是國際的勢力，要戰勝這種勢力，就需要有工人底國際聯合，工人的國際親密關係。

我們是反對民族仇視，反對民族糾紛，反對民族特殊化的。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力圖實現使全世界各國工農密切聯合，並完全溶合為一個統一的全世界蘇維埃共和國。

（列寧：“關於戰勝鄧尼金事致烏克蘭工人和農民的信”，1920年，載“列寧文選”兩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660頁）

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可能用我國內部力量來解決無產階級和農民間的矛盾，這就是在其他國家無產者的同情和支持下，但無須其他國

家无產階級革命的預先勝利，无產階級可能夺得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來在我國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沒有这种可能，社会主义建設就是沒有前途的建設，就是沒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的建設。要是不相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要是不相信我國技術落后并非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条道路上不可克服的障碍，就不能建設社会主义。否認这种可能就是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設事業，就是离开列宁主义。

沒有其他國家革命的勝利，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一个國家內獲得完全的最后勝利，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說，沒有至少几个國家革命的勝利，就不可能有免除武裝干涉因而不可能有免除資產階級制度復辟的完全保障。否認这一个不容置辯的原理，就是离开國際主义，就是离开列宁主义。

列寧說：“我們不僅生活在一个國家里，而且生活在許多國家所組成的体系里，而蘇維埃共和國和帝國主義國家長期并存是不可思議的。其結局不是这个勝利就是那个勝利。而在這個結局還沒有到來的時候，蘇維埃共和國和資產階級國家間的一系列最可怕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說，統治階級即无產階級只要願意統治并繼續統治下去，就应当也用自己的軍事組織來証明這一点。”（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三三頁）

列寧在另一个地方說：“我們面前有某种極不穩固但畢竟是毫無疑义、不容置辯的均勢。这是否会长久保持下去，——我不知道，而且我以为这是无法知道的。因此，我們必須極端謹慎。我們政策中的第一个訓條，从我們政府一年來的工作中所得出的第一个教訓，所有工人和農民

都应当記取的教訓就是要时刻戒备，要記着，我們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極端仇恨我們的人、階級和政府包圍着的。必須記着，我們隨時都有遭受各種侵襲的危險。”（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一二二頁）

看來是很明白的了。

（斯大林：“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1926年，載“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64至65頁）

……第三个問題是關於某一國家內無產階級革命的“民族”任務和國際任務的問題。黨所持的出發點是：蘇聯無產階級的“民族”任務和國際任務融合為一個共同的任務，即從資本主義壓迫下解放各國無產者的任務；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利益和各國革命運動的利益完完全全融合為一個共同的利益，即社會主義革命在世界各國的勝利。

假使世界各國無產者不同情和支持蘇維埃共和國，那會怎樣呢？蘇維埃共和國就會受到武裝干涉，就會被摧毀。

假使資本得以摧毀蘇維埃共和國，那會怎樣呢？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國家內最黑暗的反動時代就會到來，工人階級和被壓迫的民族就會受到摧殘，國際共產主義的陣地就會被摧毀。

如果各國無產者對蘇維埃共和國的同情和支持加強和增長起來，那將怎樣呢？那將根本有助于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

如果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不斷擴大，那將怎樣呢？那將根本改善世界各國無產者和資本作鬥爭的革命陣地，將摧毀國際資本和無產階級作鬥爭的陣地，將使世界無產階級有更多的機會取得勝利。

因此，应得出結論說，苏联无產階級的利益和任务是同各國革命运动的利益和任务交織在一起并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反過來說，各國革命无產者的任务是同苏联无產者在社会主义建設战綫上的任务和勝利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因此，把某个國家无產者的“民族”任务与國際任务对立起來，就是在政治上犯了極嚴重的錯誤。

因此，把苏联无產者在社会主义建設战綫上的那种勤奋和热忱說成“民族閉关自守”和“民族狹隘性”的表現，象我們的反对派有时所做的那样，这不是失去了理智，就是害了幼稚病。

因此，把一个國家无產者的利益和任务跟各國无產者的利益和任务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确立起來，乃是各國无產者的革命运动獲得勝利的最可靠的道路。

正因为如此，一个國家的无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不是最終目的，而是各國革命的發展和勝利的手段和助力。

因此，在苏联建設社会主义，就是从事各國无產者的共同事業，就是不僅在苏联而且在一切資本主义國家內逐步造成对資本的勝利，因为苏联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及其發展的基礎。

（斯大林：“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会”，1926年，載“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25至27頁）

最可能的是，世界革命將經過許多新國家的无產者在帝國主義國家无產階級的援助下用革命手段使这些國家脱离帝國主义國家体系的道路發展起來。我們看見，第一个脱离出來的國家，第一个獲得了勝利的國家，已經取得其他國家的工人和勞

動羣眾的援助。沒有這種援助，它就不能支持住。毫無疑問，這種援助將會增強和發展起來。同樣毫無疑問，第一個獲得勝利的國家內的社會主義鞏固得愈徹底，這個國家變成進一步擴展世界革命的基地，變成進一步瓦解帝國主義的橫桿愈迅速，世界革命的發展，許多新國家脫離帝國主義體系的过程就進行得愈迅速，愈徹底。

沒有幾國無產者的共同努力，第一個獲得解放的國家內的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就不可能，這個論點是對的；同樣，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給予其餘各國工人和勞動羣眾的帮助愈切實，世界革命的發展就愈迅速愈徹底，這個論點也是對的。

這種幫助應當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這種幫助應當表現在獲得勝利的國家“最大限度地實現一個國家內所能實現的一切，以便發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國的革命”（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六九頁）。

第二、這種幫助應當表現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然剝奪了資本家并在本國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就……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國家的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掀起反對資本家的起義，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剝削階級及其國家”（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頁）。

獲得勝利的國家所給予的這種幫助的特點不僅在於它加速其他國家無產者的勝利，而且還在於它以促進這個勝利來保證社會主義在第一個獲得勝利的國家內的最後勝利。

最可能的是，在世界革命的發展過程中，與個別資本主義國家的帝國主義策源地和這些國家的全世界體系并列，會出現

個別蘇維埃國家的社会主义策源地和這些策源地的全世界體系，而這兩個體系間的鬥爭將充滿世界革命發展的歷史。

列寧說：因為“沒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國對各後退國家的相當長期的頑強鬥爭，便不能實現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聯合”（同上）。

十月革命的世界意義不僅在於它是一個國家在衝破帝國主義體系這一事業中的偉大創始，它是帝國主義國家汪洋大海中的第一個社会主义策源地，而且還在於它是世界革命的第一階段，它是世界革命進一步發展的强大基地。

因此，不僅那些忘掉了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說革命在一個國內勝利純粹是一國的而且僅僅是一國的現象的人是不對的，而且那些雖然記得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但是竟把这个革命看做一種只應接受外援的被動現象的人也是不對的。實際上，不僅十月革命需要其他國家革命的援助，而且其他國家革命也需要十月革命的援助，以便加速和推進推翻世界帝國主義的事業。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1924年，載“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346至348頁）

讓我代表我們的代表大會，向所有派遣代表光臨我們的代表大會或給代表大會拍來賀電的兄弟的黨和團體表示謝意，感謝它們的友好祝賀，感謝它們希望我們成功的願望，感謝它們的信任。

我們特別珍視這種信任，這種信任表示它們決心支持我們黨為各國人民的光輝前途而鬥爭，為反對戰爭而鬥爭，為維護和平而鬥爭。

如果認為我們黨已成為強大的力量，而不再需要支持，那就錯了。這是不對的。我們黨和我們國家過去始終需要，而且將來仍然需要外國兄弟人民的信任、同情和支持。

這種支持的特點就在於：任何兄弟黨對我們黨的和平願望的一切支持，同時也就是對其本國人民的維護和平的鬥爭的支持。在1918—1919年英國資產階級武裝進攻蘇聯的時候，英國工人在“不准干涉俄國”的口號能下組織了反戰鬥爭，這就是支持，首先是对他們本國人民的爭取和平的鬥爭的支持，其次也是對蘇聯的支持。現在多列士同志或陶里亞蒂同志宣布他們國家的人民決不對蘇聯人民作戰，這就是支持，首先是对法國和意大利正在為和平而鬥爭的工人和農民的支持，其次也是對蘇聯的和平願望的支持。這種互相支持的特點是由於：我們黨的利益與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利益不但沒有矛盾，相反地，而且是融合在一起的。至于蘇聯，它的利益是根本不能跟全世界的和平事業分開的。

自然，我們黨不能不報答各個兄弟黨，我們黨必須也給各個兄弟黨以支持，同時也必須給它們本國的人民爭取解放的鬥爭、維護和平的鬥爭以支持。大家知道，我們黨就正是這樣做的。在1917年我們黨取得政權以後，在我們黨採取實際措施來消滅了資本家和地主的壓迫以後，各個兄弟黨的代表對我們黨的勇敢和成功表示敬佩，給予我們黨以世界革命工人運動“突擊隊”的稱號。他們以此表示希望這支“突擊隊”的成功減輕在資本主義壓迫下呻吟的各國人民的痛苦。我認為，我們黨並沒有辜負這種希望，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蘇聯粉碎了德國和日本的法西斯暴政，使歐洲和亞洲的各國人民解脫了法西斯奴役的威脅。（熱烈的鼓掌）

当然，只要这支“突击隊”还是唯一无二的，只要它还几乎是單槍匹馬地执行这个先進的任务，那末，执行这个光荣的任务就是很困难的。不过，这是过去的情况。現在，情况已經完全不同了。現在，从中國和朝鮮直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已經出現了人民民主國家这些新的“突击隊”，——現在，我們黨進行斗争是比較容易了，而且工作也進行得比較愉快了。

（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1至4頁）。

……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

自从帝國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說我們可以不需要國際援助；不，國際援助对于現代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古人說：“春秋无义战。”于今帝國主义則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階級有义战。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來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义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國人民的革命是义战。中國的反鴉片战争，太平天國战争，义和团战争，辛亥革命战争，1926年至1927年的北伐战争，1927年至現在的土地革命战争，今天的抗日和討伐賣國賊的战争，都是义战。在目前的全中國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义战將遍于全中國，全世界。凡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凡非义战都是應該使之轉变成为义战的，这就是列寧主义的路綫。我們的抗日战争需要國

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們也一定会援助我們，因為我們和他們是休戚相关的。过去一个时期內，中國革命力量和國際革命力量被蒋介石隔断了，就这点上說，我們是孤立的。現在这种形势已經改变了，變得對我們有利了。今后这种形势还会繼續向有利的方面改变。我們不会再是孤立的了。這是中國抗日战争和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毛泽东：“論反对日本帝國主义的策略”，1935年，載“毛泽东选集”第1卷，1952年二版，156頁）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題，还是在1924年至1927年的中國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的。这是中國共产党人提出，而为当时一切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們所贊成的。不过那时这一理論的意义还没有發揮，以致人們还只是模糊地認識这个問題。

这种“世界革命”，已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資產階級世界革命早已完結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同样，这种“一部分”，已經不是旧的資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絕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以來无可比拟的大变化。

中國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題，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論的。

斯大林还在1918年所作十月革命一週年紀念的論文时，就說道：

“十月革命的偉大的世界意义，主要的是：第一，它擴大了民族問題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

的局部問題，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國主义之下解放出來的总問題；第二，它給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進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把他們吸引到勝利的反帝國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間架起了一道桥樑，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產者經過俄國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國主义的革命战綫。”

从这篇文章以后，斯大林曾經多次地發揮了关于論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脱离了旧范疇，改变成了无產階級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理論。解釋得最清楚明确的，是斯大林在1925年6月30日發表的同当时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爭論的文章。这篇文章載在張仲实譯的“斯大林論民族問題”一書上面，題目叫做“再論民族問題”。其中有这么一段：

“舍米契引証了斯大林在1912年年底所著‘馬克思主義与民族問題’那本小冊子中的一个地方。那里曾說：

‘在上升的資本主义的条件之下，民族的斗争是資產階級相互之間的斗争。’顯然，他企图以此來暗示他給当前歷史条件下的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所下的定义是正确的。然而，斯大林那本小冊子是在帝國主义战争以前寫的，那时候民族問題在馬克思主义者看來还是一个具有全世界意义的問題，那时候馬克思主义者关于民族自決权的基本要求不是当作无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当作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自那时候起，國際形势已經根本地改变了，战争和俄國十月革命已把民族問題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產階級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